

苏晖访问香港浸会大学

总结报告

受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资助和香港浸会大学的邀请，我于 2005 年 9 月 1 日至 2006 年 5 月 31 日于香港浸会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进行了为期 9 个月的学术访问和研究。

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是 1956 年由基督教会组织创办的，现在已成为香港 8 所公立大学之一。该校以“全人教育”为其教育目标及理想，其校训为“笃信力行”。大学创办至今，一直致力于通过教学与研究，广纳贤才，服务社会，探求学术，陶冶情操，实践全人教育，追求卓越成就。大学实行英语授课，以配合国际化的需要。除一般课堂的学习外，浸大亦通过人文素质的训练，让学生有机会全面地接受全人教育。

我在访问浸会大学期间，主要的成果和感想如下：

一、学术活动及成果

在访问期间，我为香港浸会大学英文系本科生讲授“*The Impact of Fitzgerald in China*”及“*Shelly's Ode to the West Wind*”等专题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就喜剧美学、狂欢化文学等主题做了两场专题学术讲座，引起了香港同行的很大兴趣和热烈的讨论；将自己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西方喜剧美学的现代发展与变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赠送给浸会大学英文系的部分老师和博士生，浸大也将印有大学标志的纪念品赠予苏晖老师留作纪念。

我还参与了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多种教务与学术活动，例如参加香港浸会大学第 50 届开学典礼、第 46 届毕业典礼、50 周年校庆典礼、文学院院长务委员会会议，参与学术会议或讲座“*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Western Drama in Hong Kong*”、“*Communicating Poems*”、“*Reading Terror in Henry James' The Princess Casamassima*”、“诗歌与音乐”、“文学与历史记忆”、“文学的火花：文体拼贴”、“柏林列宁广场剧院演出《娜拉》座谈会”、“学文之道——从‘文’的观念探讨语文、文学、文化的教与学”、“名贤讲席——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学科视野”、“转型中的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挑战”等，对香港的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的编辑，我为杂志进一步展开与香港以及国外学者的合作付出了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与香港浸会大学英文系 Dr. Christie 合作组织“菲茨杰拉德研究”专栏（由美国、香港和内地学者撰写的 3 篇文章组成）；采访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谭国根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编委），写成访谈稿《比较文学研究：道路与方法——香港中文大学谭国根教授访谈录》，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

我也尽力为加强华中师范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的联系与合作做了一些工作，

我向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教授、副校长曾宪博教授、文学院院长钟玲教授、英文系主任叶惠娴教授转达了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教授、文学院院长胡亚敏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聂珍钊教授加强两校合作的愿望，浸大各级领导也表示希望两校今后能开展更多的交流。

二、体会与感想

我除了访问香港浸会大学，也了解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城市大学等的情况。我认为香港的大学教育有许多值得内地大学借鉴的方面：

1、在课程设置、课程管理、授课方式、考试方式、成绩评定等方面都有值得内地大学借鉴的地方。

包括浸会大学在内的香港的高校几乎所有的课程都用英文讲授，实在是让我大开眼界。老师开课都很有个性色彩，同时非常注重理论分析与文本实际的结合，也非常重视学生的参与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他们所有的课程都分为讲授和讨论两个部分，每周一次 lecture，以老师讲授为主，另外有一次 tutorial，老师和学生对话，每次都有一个中心议题。学生的成绩中，讨论占总成绩的 20%，作业占 40%，期末考试也只占 40%。每门课程都开出必读书目，主要是文学作品，一般是 3 至 5 部，也有一些理论书和参考书。学生要参加讨论和写作业，就一定要读这些书。大部分老师授课时都以对作品的分析为主，一般都能以小见大，对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审美判断力大有好处。当然也不排除有的老师只是带着学生把作品有关文字读一读然后稍加讲解，既无系统性也无理论深度。

这里的教学管理也很现代化，每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时间安排、参考书目以及课件都会挂在网上，供学生浏览和参考。

2、老师工作态度认真，责任心极强。加上办学设施较为现代化，老师与学生的交流较多，对于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都有很大帮助。

香港的大学每位老师都有办公室，并将办公室电话和电子邮箱告诉学生，以便于联络。老师每周都有至少两个半天专门用于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每学期学校都对教师的工作进行评定，包括教师之间的打分，学生给老师的打分等，结合老师的科研成果，决定是否给老师的工资晋级。

3、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少，老师的指导比较得力；硕士生、博士生也能通过做助教、助研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香港的大学教授所带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少，加上研究生必须在第二年通过前期考试（一般为三门，必须读大量的书籍，有相当的研究能力才可能过关），否则就取消奖学金或退学；毕业论文也必须有在该研究领域有世界影响的学者评阅或参加答辩；日常的活动，包括听课、与老师交流、开题报告、答辩等大都用英语，因此，研究生普遍都十分用功，感到压力很大。

另外，香港的硕士、博士一般都要为导师做很多事情，包括上本科生的讨论课（tutorial），监考和阅卷，帮老师查资料、借书，一起做课题、写文章等，当然，这些工作也锻炼了他们的能力，提高了专业水平。

4、在学术研究方面，重视实证研究和具体研究，从微观入手，深入探

讨问题；也重视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和对话。

从总体来看，香港高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是基本西化的，他们重视实证性的研究和比较研究，就文学来讲，重视文本的解读，重视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和对话，不少教师都毕业于英美著名大学，也有一部分外籍教师，老师们的学术成果多半都以英文撰写，并发表在国外的著名刊物上。当然，受香港的商业文化影响，学生对学术的热情普遍较低，我在橱窗里看到中文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感觉总体水平不高，真正富有新意、学术价值较高的选题好像很少。

5、图书馆所藏英文书籍比较丰富，管理也现代化。

浸会大学图书馆不仅藏书丰富，而且设施齐备，读者只要持卡进入大门，就可以在馆内任意检索、浏览或阅读，复印也是自己持卡操作；如果外借图书，手续很简单，还书更简单，只要放入图书馆外的一个大桶里就可以了，管理员自然就会将借书记载销掉。

馆际之间的互借也是很方便的，图书馆可以为读者代办这类服务。总之，香港图书馆的现代化设施和管理都值得内地学校借鉴。

6、学术气氛浓厚，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学术讲座等活动频繁。

香港的大学学术氛围很浓，会议、讲座、学术活动接连不断，海报栏总是有各种学术交流的信息。尤其是大学经常能邀请到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比如2005年12月浸会大学文学院举办的“名贤讲席”，就邀请了六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知名学者进行精彩演讲，包括李欧梵、王德威、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黄子平等，即哈（佛）--哈--京--海--海--港，他们演讲的主题是“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学科视野”，虽然主要是探讨有关现当代中国文学学科领域中的一些问题，但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这一界限，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2006年3月文学院邀请于光中来讲座，并举办诗歌朗诵会，会聚了香港不少著名诗人。浸会大学的国际作家坊也很有特色，每学期都邀请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国内外知名作家主持作家坊，为学生上课、指导写作、举办讲座等。

7、法制健全，大学在招生、成绩评定、教师考核等方面少有腐败现象，也很少见到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现象。

香港的法制健全，监督和惩罚措施得力。总体来讲，香港社会秩序良好，假冒伪劣产品较少，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大吃大喝的现象不太多见，民主意识深入人心。

我刚去香港时，给浸大英文系主任带了一个黄鹤楼的台座作为见面礼，大概花了一百多元钱，但她说她不能放在自己的办公室，而是会把这个礼物放到英文系会议室陈列柜里面。她告诉我，香港法律规定公务员如果因职务关系收取500元以上礼物或礼金，就要上报，否则要受到惩罚。她平时收到学生送的糖果什么的，都会退回去或拿到系办公室与其他老师一切分享。她从来不让学生或系里的老师请她吃饭，她和我两次一起吃饭，都是她用自己的钱付的款。尽管其他老师并不一定能像她这样自律，但至少说明香港的确是一个法制社会，法律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想这对于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是大有

裨益的。

如果让我结合在香港访学的经历对学校工作提出一些建议的话，我想大概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

- 1、加强双语教学，以利于与国际学术接轨
- 2、尽量小班教学，某些课程可增设讨论课
- 3、为老师提供办公室和设备，加强教师对学生的指导
- 4、减少研究生招生人数，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 5、图书资料及管理亟待现代化
- 6、加强与外校特别是与国际的学术交流

总之，我此次对香港浸会大学的访问，不仅使自己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获得了调整和反思的时间和空间，而且为华中师范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两校展开更多层次的合作与交流奠定了基础。如今我已获得国家教委出国留学基金博士后项目资助，拟于 2007 年 8 月赴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我将会更进一步为扩大华中师范大学以及《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在国际上的影响作出自己的贡献。

苏晖

2006 年 12 月 31 日